



守望

汪燕红

中午，去妈妈家里吃饭，妈妈让我拿根莴苣晚上回家小炒着吃，细细嘱咐我莴苣炒肉丝、番茄的做法。说肉丝和番茄在桌上，莴苣在墙角。

墙角依偎着六七根莴苣，透骨新鲜。问妈妈这些莴苣是表姨送的吧，妈妈随口应了声，说是从地里刚摘来不久。

表姨和妈妈嫁到了同村，亲戚加邻居的双重身份，让两户人家越来越亲近。我家有什么好东西，妈妈常会匀一点送过去。夏天的几瓶沐浴乳和洗发精，冬天的一些时令水果和糕点，我送给妈妈，妈妈舍不得享用，转手就送到表姨家。怕我不开心，妈妈总是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说，一年到头，吃了表姨家这么多东西，得还人情。

表姨家以前日子过得很紧，两户人家走动以情感交流为主，很少有物质上的互动。我们小时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表姨家，大人们见面就絮叨，老有说不完的话题，彼此倾诉着生活的困顿、烦恼，相互支撑着一起度过艰苦的人生。

前些年，表姨家承包了十亩地种葡萄，经济渐渐宽裕起来，表姨时不时会送些地里的蔬菜和葡萄过来，有时候，她送过来，妈妈不在家，她放下菜就走了。刚开始会闹乌龙，一天午睡后，爹起床发现床脚多了颗大白菜，却又想不出是谁送的，就开心地对我们吹嘘，他梦见在白菜地里玩，醒来才发现把白菜从梦里摘过来了，乐得我哈哈大笑，听得妈妈暗自撇嘴。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家里无故多出来的番薯、菜瓜等都是表姨送的，爹也就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夏天，是表姨家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日子，他们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不停剪葡萄卖葡萄，爹常常去帮忙剪葡萄，回来时带点散落、小串葡萄过来，笑称这些是工钱。为此，妈妈常会生气，告诫我们，表姨家赚的是辛苦钱，不要去惦记她家的葡萄，不准带人去吃她家的葡萄。等表姨家葡萄卖得差不多了，表姨请了好几次，妈妈才肯发话，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想去可以去了，再不去，葡萄要落市了。可妈妈却一次也没有陪我们去摘过，无论我们怎么邀请，她都拒绝了，仿佛一起去摘葡萄，蹭表姨家的便宜，对她是件很羞愧的事情。

去表姨家摘葡萄，表姨见了就念叨爹的好，说，那次台风过来，幸亏你爹帮忙，一起冒雨摘葡萄，修棚搭薄膜，像自家人一样，毫不吝嗇力气，帮了大忙了。我们去了，表姨客气地放下手头紧赶着装箱的活，陪我们到一个特意留起来还没采摘过的大棚下，一起挑葡萄、剪葡萄，郑重地装箱送给我们，仿佛我们是她家最隆重的客人，她那由衷的欢欣，常让我感动、惭愧。

妈妈和表姨守望相扶着一起度过了漫漫岁月，她们俩从没吵过架、斗过气，亲情在友情的浇灌下，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蚀，不仅不显斑驳，反像老酒般一日醇过一日。

小叔曾在部队当过炊事员，退伍后，开了生煎店，取名“祥泰”。

那时镇上还没生煎店，小叔盘下了镇大路最繁华地段的一家店面，开业那天，小叔请来了十几个部队里的战友，他们齐刷刷坐在一起，一眼望去，一片绿军装。店内北边靠墙设一口大灶，搁着平底大锅，小叔就在烟雾缭绕中，放生煎，刷油、催火、放葱，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然后把起锅的生煎分盛在碗里，由我小舅母分送到各桌。那天光顾过的人无不对生煎的味道赞不绝口，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前来品尝的人就络绎不绝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小时候寄养在外婆家，小叔开店后，外婆要去照顾表弟，将我一并带上。每天早晨，我从小叔住的出租屋出来，沿着一条小河走上一段路，看一会河面上的鸭子，河埠头上搓衣服的妇女，拐上镇大路，走进生煎店，选一个座位坐下，这时小舅母就会把十个热气腾腾的生煎和一碗豆浆放在我面前。一旁是小叔忙碌的身影，以及一张张洋溢着微笑的顾客的脸。

生煎店的成功在别人看来已是了不得的事，但对小叔来说，这只是第一步。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关掉店面，投入另一个行业：铜字铜牌。

这在当时还是个新兴产业，那个年

小叔

赵雨

代，镇上各种门店如雨后天春笋，越冒越多，有店，就少不得那块门面，阿毛五金店、小林理发店、百货大楼、中心商场……比比皆是。小叔的理由是，生煎生意再好，毕竟是早餐，利润不大。他当机立断，把赚来的钱全投了进去，不够，就到我老家来要求合资。我爸只求安稳，一听要拿钱去做生意，先惊了惊，我妈却爽快地说：“你讲实话，把握多大？”小叔想了想说：“八成总是有的。”我妈说：“这就够了。”当即拿了两万元给他。

从那以后，小叔就脱下白围兜，夹着黑皮包跑业务去了（技术活他请了个老师傅和一个徒弟），他到过本省的所有县市区，一度还出过省，那段日子用小舅母的话讲是十天半月见不着人影。有时出门在外，为节省费用，一天只吃一个包子，这样勤勤恳恳，一年下来，铜字铜牌店就立起来了。他似乎特别喜欢“祥泰”这个名字，把它沿用给了新店，店址就在生煎店上，面积扩大了一倍，又过了一年，业务更大了。那两年，没人知道他究竟赚了多少钱，但从两件事上可看出些端倪：

一、翻新了老家的老屋。这原是分家时外公给的，60平方米，他拓成了120平方米，两层楼，用当时最流行的款式装修，有抽水马桶、浴缸，尤其是那张一米八的大床，柔软舒适，我和表弟一躺下去就不肯起来。办“进屋酒”那天，小叔把

外公、外婆请到首座，外公平时一副严肃的样子，那天也多喝了几杯，听到敬酒的人夸小叔多么有出息，笑得不住点头。

二、买了辆“本田王”摩托车。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买来的那天，很多人来晒场上看。天蓝色的车身、高昂的车头、黑漆皮坐垫，粗实的双轮和锃亮的排气管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小叔站在车旁，任人观瞻一番，然后对我和表弟说：“带你们兜风去。”我们便一前一后爬上座位，小叔横跨上摩托，踢起“撑脚”，扶住把手，回转过两下，排气管发出“噗噗”声，一阵白烟，车身向前冲去。

小叔沿着河道一路开，岸边景物更迭交替，河面像一块白布向后拉动，一只白鹭在上面点了一下又飞到天空。机耕路坑洼不平，路面不时可见几堆牛粪，小叔左避右让，虽不时颠簸几下，但安然无恙。我们一直开出村子，进了邻村地界，这里的田地更多，无遮无拦，显得空旷辽远，远山在一片青翠中。到后小叔把车停在路边，躺到一旁的油菜花丛中，彼时，橙黄的花、蓝色的摩托、白色的云朵，不远处的庙宇传来轻轻的水鱼声。小叔在清风中把两手交叉枕在头下，似乎睡着了。

这就是我的小叔。很多年后，我回想那天的天光云影，心中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温暖感，小叔犹如被一团蓝丝绒包裹，脸上挂着宁静、安详的微笑。

姑婆

叶龙虎



姑婆属马，生于光绪八年，比我爷爷小四岁。她老人家的样子我没有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她每次来我家，总是先听见拐杖敲到石板路上的“笃笃……”声，一进门就喊“小哥”。往往这个时候，爷爷会从堂前的后半间迎出来，喊着“阿妹”，然后搀扶进屋。老人们聊一会后，姑婆就坐进我家的草鞋床，做好几双草鞋拎到街上，用卖草鞋的钱，买糖果分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兄妹每人只能分到半粒。偶尔，姑婆也会留在我家吃中饭，父亲叫她阿姑，她叫父亲阿五，很亲切。

姑婆的家在朱家山头的后房。小时候我跟着爷爷去过她家，也就唯一的一次，当时我才7岁，还没读书。记得是大门朝东的一排高平房，北山墙外有一个竹园，我是与爷爷一起从文山回来后到姑婆家的。那天，爷爷与姑婆坐在圆桌子旁边说话，我在一边玩耍。这以后，我每次去文山的外婆家，走到朱家大山南麓时，总要侧过头去，用目光搜索竹园后边的姑婆家的老屋。

记得那天一大早，爷爷就带着我出门了。第一站是到石道地。跨进一座老房子的大门，爷爷站在檐头口，那妇人在我眼里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她叫爷爷小舅舅。现在才知道，她是姑婆的大女儿。檐头口好像有点暗，她让爷爷进屋，爷爷没进去，只是站着说些什么，说完就走了。第二站是溪塘头，也没进去坐，只是与一位妇人说话，没说几句也告辞了。她是姑婆的三女儿。最后一站是到文山。文山是位老太太，她的大孙女就是我的母亲，而

她的小女婿却是姑婆的外孙。因此，从我母亲这边叫，我应该叫她太外婆，而按我父亲这边叫，父亲的大表姐成了她的儿女亲家，我叫她姆妈就够了。爷爷与她家又是世交。这多重关系，使得两位老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说得投机，那天的中饭也是在她们家吃的。文山我熟，老太太的大儿子是我的外公，我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去隔壁找外婆，可爷爷不让乱跑，我只好乖乖地待在小屋门口的篱笆旁边玩耍。

姑婆有五女一子。女儿们分别嫁给石道地的刘氏、城里厢（今慈城）的杨氏、溪塘头的范氏、西竺的缪氏和上钱的曹氏。家住西竺、今年已经72岁的缪祖士告

诉我：“我的外婆就是你的姑婆，我们是表亲。我妈是外婆的第四个女儿。外婆的第三代有13个外孙、14个外孙女、2个孙女，一共29人，也算是子孙满堂了。可是她苦，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天下最悲痛的事都轮到她了。外婆长年做草鞋，两三分钱一双，好在她草鞋做得好，经穿、不夹脚，都是附近农民预先来定做的，倒也供不应求。她老人家春天上山采摘刺花，由你爷爷带到上海的药店去卖；夏天下田捡稻穗，稻穗掺入溪边摘来的灯芯草籽磨成粉，做成菜糊充饥。外婆去世时，打开她的衣橱，里边藏的都是稻田里捡来后晒燥的稻穗。”听了这样的话，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8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弯着腰在泥泞的稻田里捡稻穗的身影。

姑婆对第三代很疼爱。她二女儿的长子告诉我：“小时候，外婆当我是‘外孙皇帝’，对我百依百顺。每年杨梅时节住在外婆家，外婆关照我只能门口三块石板内玩，出门会被老虎吼走。传说后山有老虎，村里常常丢失小猪小羊等牲畜，还叨走过小孩。这样的恐慌，直到老虎被县府派人猎杀后才平息。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事，打死的老虎还在县政府门口展览过，当时我才9岁。”

姑婆过世快半个世纪了。那天我去朱家山头，一些老人还在念叨她，说她如何肯接济邻里；说她会刮痧气、提痧筋，会用银针治疗中暑、静脉曲张等一些常见病。不管家里多么困难，在人前总是一副热心肠。经她施治的人很多，从来不收人家的一分一厘谢意。

人到球场上，不必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要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2009年单飞后的初期，由于我们长期食用的营养餐是统一配备的而非为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我有过感觉体力顶不上的经历。后来请了专用营养师、健身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我开始单飞旅程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运作模式感到疑惑，我对此不置一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事实胜于雄辩，只有拿出成绩才能让流言不攻自破。

2008年之前，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凡事只要听从家长安排好就好。2008年底单飞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我才发现旧有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什么都有人管，什么都有人安排。现在这些都要你亲力亲为，说白了，你就是这个团队的老板，有权去选择和开除员工，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你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达到最佳状态。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订酒店、订机票这些事情都是国家队管，2008年年底所有的事都由我们自己处理。团队成立前期，我们对这些流程不是很熟悉，这时托马斯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份工作，让我能够投入更多精力在训练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教练除了训练外还要坐在电脑前敲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键盘来完成行程安

排，是件多可怕的事。

托马斯是瑞典人，40多岁，有点谢顶。可以说正是这个瑞典人让我真正地走入职业网球圈。他是一个训练上非常积极的人，在场上永远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不知道疲惫。从他第一天带我的时候他就坚信我可以进世界前十，可以进四大公开赛前四。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坚信自己可以进世界前十的教练。

托马斯在这个圈子待的时间比较长，训练水平很高。我们在国家队时，关系就非常融洽，是很好的朋友，但那时的托马斯要照顾所有队员，能分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成为我的私人教练后，托马斯和我深入沟通了几次，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托马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很喜欢和人聊天。准确地说，是他非常喜欢说话，和他聊天，你不需要说很多，托马斯一个人可以声情并茂地把国际网坛分析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出了网球场，逮什么聊什么，跟他在一起训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托马斯就会忽然警觉，他会问：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我都说了这么多了，要不你也说点啥？

赶上这时候，我也说说点自己的看法。托马斯在倾听球员意见的时候是个充满耐心的人，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想法，他对球员的意见都十分尊重，是个允许球员有自己意志的人。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

本版摄影 青衫客 总第5625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网坛风雨路

——李娜自传

63

“单飞”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我要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通过一位热爱网球的香港友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让我支付不起教练的费用）留住了原国家队的教练托马斯·霍格斯泰特（Thomas Hogstedt），他成了我第一个自己请的外籍教练。

姜山自然也是我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的团队还包括：医生、体能教练、技术教练、治疗师，基本就这几个人了。其中治疗师并不是一直跟着我们。他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做康复训练，偶尔会带我练一下体能，比赛时我们才会带上他。除了姜山，团队所有人的费用是按周薪计算的。所以，我每年都会跟治疗师谈这一整年的计划，告诉他们哪个比赛需要他们过来。

我现在的治疗师叫阿莱克斯（Alex），我们是从2010年3月通过托马斯的介绍而开始合作的。阿莱克斯跟着我全世界跑，一年大概要工作25—30个星期左右，他的工作是为我放松做治疗，每天训练完后他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我做治疗加按摩，这样有助于恢复。自从他来到我的团队后，我没有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我可以全身心地投